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 郑奕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博物院考察时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以满足社会需求。学校教育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用“大学校”比喻博物院，生动形象地强调了“教育”是博物院的首要目的和功能，同时预示着院校合作、文教结

合的无限可能。

博物院中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见证着国家的历史，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学校”为喻，旨在让博物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文化滋养，让更多人在这所“大学校”中学习传承、研究思考。在此基础上，通过让历史知识和文物展陈“说话”的方式，将灿烂文明、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向观众娓娓道来，反映文物的多重价值。

博物院和学校一样，在培育新时代公民上具有相似的使命，“立德树人”是共同目标。博物院不仅传播知识，也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润物细无声地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博物院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它作为国民教育的特殊资源和阵地，拥有一系列优势。一方面，以实物例证进行阐释和传播，并直接作用于观众的五官，强调亲身参与和互动体验，可谓是立体的“百科全书”、实物的“图书馆”。另一方面，博物院的教育对象具有广泛性，是全社会成员。鉴于此，博物院在全民教育、终身学习方面意义重大，可助力我国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博物馆和博物院虽有一字之差，在性质、规模、发展历史上有所区别，但二者同根同源，都是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的文化教育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日益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博物馆总数排名全球前列。全年举办线下展览3.4万个、教育活动近23万场，接待观众5.78亿人次，线上展览近万个、教育活动4万余场。博物馆正与学校教育积极结合，以形成协同育人的“同心圆”。

截至2022年底，我国有中小学（包括高中）21.66万所，有备案博物馆（包括博物院）6565座，外加博物馆界自2008年起施行减免费开放政策，中小学利用场馆学习、实践的机制正在加速形成。其一，中小学生在场馆内进行社会性劳动和服务。其二，文博工作者可走进中小学或是在场馆内呈现和介绍文物保护和管理、研究和利用的进程和结果，让文物“活起来”和“火起来”，继而增强未成年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其三，场馆可以充分发挥“第二课堂”作用，扩增青少年、儿童自主认知、体验、感悟、抉择、践行原真性体验的机会，增强教育的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殿堂，博物院也同样是传播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地方。未来要进一步健全院校合作机制，促进博物院资源融入教育体系，提升学生利用博物院的学习效果，让学习过程更快乐、更有幸福感。同时，依托博物院传递的巨大精神力量，点亮道德明灯，共筑精神家园，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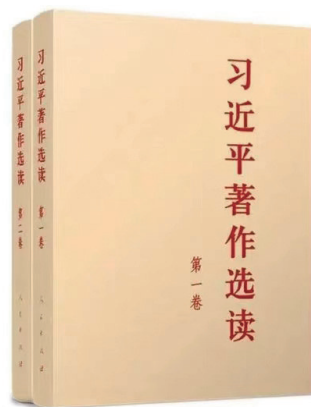
锚定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前进方向

——读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 陈积敏 孙新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是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今年恰逢这篇重要文献发表十周年。文献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科学分析了世界发展大势，敏锐洞察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并首次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战略要求，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确定了目标、规划了路径。

强调研判世界大势要有辩证思维与历史思维

准确认识世界大势，科学把握时代脉搏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各种变量交织影响，研判世界大势必须要有辩证思维，即要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

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针对国际环境急剧变化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鲜明提出五个“要”与五个“更要”的战略判断，即“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这一战略判断既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国际形势演变的错综复杂性，又高瞻远瞩地洞见了世界发展大势的未来走向，在明确当前外交工作重点的同时更坚定了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信。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我们身处其中，往往容易被乱花迷眼、浮云遮眼，难以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因而，研判世界大势还需要有历史思维，即“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在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中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周边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发生了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我们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为我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提供正确指引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并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因此，我国同国际

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具体表现为两个“不断加深”，即“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与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外交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推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更好发挥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的负责任大国作用。这客观上需要对我国外交作出符合中国身份与地位、体现时代特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新的战略定位与目标要求。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便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深刻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则立场、理念目标与战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外交的原则立场、理念目标与战略路径。

从原则立场上看，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新世纪以来，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同时坚决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

利益。中国外交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从理念目标上看，中国坚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与秉持的合作共赢理念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的“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反映了各国人民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指引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合作共赢理念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目标的引领下，我们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从战略路径上看，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提倡并践行的伙伴关系，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合作性特征，致力于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积极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全球伙伴关系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是一条通向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

学人小传

陆学艺（1933.8.30—2013.5.13），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出版《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等专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



“菜市场里有学问”

——社会学家陆学艺的治学之道

□ 李晓壮

构成陆学艺学术人生最为内核的要素是“智慧”，它既是一种精神境界，又是一种人生态度。

看得最重的是自己的成果能不能推进社会进步

通常而言，智慧似乎仅是后天的、经验性的东西，但从智慧的性质、品位和运用看，它却受制于人格。凡是有成就的学者不仅有一套独到的思想观点，而且必有独特的“智慧”，而这种独特的“智慧”必以其人格为前提。

陆学艺始终保有一颗学识为公的“公心”。1956年，高中阶段的陆学艺就“立志要在党和前辈们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一个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这一宏愿倾力于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给社会带来福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到大兴县“开门办学”，大学阶段的陆学艺便跟着社员下地干活，与黄村镇东芦城公社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59年“社会主义再教育”，陆学艺被派到黄村镇西芦城给大队支部书记做助手。陆学艺回忆这些经历时说：“作为农家出身，我对农村并不陌生，但在芦城这里学习到农村知识是最多的，是我研究农村解剖的第一只麻雀，是我分析观察农村运行、政策臧否的一个窗口。”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的发展迎来重大转变。对陆学艺的学术生涯来说，也

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他投入到这场巨变中，撰文为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鼓与呼。1979年，针对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种种非议和指责，他前往安徽等地调研，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2012年夏，晚年的陆学艺考察黑龙江等地产粮区后写成《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向中央建议要确保中国粮食安全，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三农”力作，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如今已变成了现实。

陆学艺认为，社会学的历史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他的学术作品也正是为此而立说。陈锡文回忆陆学艺时说：“他非常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的，写多少东西对他来说是次要的，而他看得最重的是自己的成果能不能推进社会进步。”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回忆道：“学艺为人民福祉建言的诚意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勇气一直让我心仪。”

“哲学里学的东西，到社会学方面都用得上”

青年马克思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哲学的实践价值在于给予人们某种思维方式，哲学是陆学艺治学的基础，也是他智慧的灵感。

陆学艺1956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光学仪器系，一年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听过两年

哲学大家冯友兰讲授的哲学课，也是冯友兰的关门弟子。1962年，陆学艺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师从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容肇祖，主攻宋明理学，1965年毕业后留所专研中国哲学史，直到1978年转向社会学研究。

陆学艺的哲学功底为他之后的“三农”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功底，提供了学术研究智慧的养分。陆学艺说：“哲学里学的东西，到社会学方面都用得上。”他并不认为从哲学到社会学研究的转型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陆学艺的儿子陆雷回忆说：“他不是通过学习现代化的理论或研读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去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是依靠自身方法论的训练，哲学的抽象能力去分析、厘清从调研中收集的材料，用朴素的视角去写作，用常识去建构他的策对，他的文章。”

用实地调查研究积累经验

费孝通说：“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不是在事先制定表格的，这一个分别却很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用实地调查研究来积累经验，而积累的经验，实际上是对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新的科学认识。这一新的科学认识便是增长的智慧。陆学艺所著《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



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化》等文章，无一不来自他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而形成的经验积累。

陆学艺在很小的时候就曾做过农活，有一些切身体会。1950年2月从上海学徒回乡，还担任整赋工作组参加过乡里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陆学艺从未间断过对“三农”领域的关注，他抓住上学期间的寒暑假、当时农村搞“小四清”“大四清”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调查农村、研究农业、了解农民，逐渐形成对农村政策、农业政策、农民致富的看法。1978年，陆学艺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思考与经验，写成《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共12条，近4万字。同年10月在《国内动态清样》摘要发表近9000字。这篇文章也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政治部主任宋一平的注意，特意找陆学艺谈话，请他以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建议他经常到各地农村去调查，而且允许他查阅内部资

料，对其日后的“三农”问题研究起到重要方向指引作用。

1985年，我国粮棉生产在连续几年快速增长之后，出现较大幅度减产。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从“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的“计划性减产”，不必过虑。陆学艺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指出，“1985年减产不是偶然的，相关部门对粮食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放松了领导，粮食播种面积调减步子跨得太大，特别是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和生产资料涨价，种粮成本高，收益低，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将调研内容以《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发表，深入分析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11个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同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提及了陆学艺的观点，邓小平强调：“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真正的学问在下面

陆学艺的“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扎根广阔的田野泥土中勤奋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实践出来的。他早年间养成的实地调查方法一直沿用终身，为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方法论基础，且他的实地调查方法是非“本本”可见的。

例如，每当到一地开展研究，陆学艺都要做到去村里、县里走一圈，他

每到一村、一县都能很迅速地“接上头”，很快熟悉起来，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当过“县官”，与乡村里的老乡、县里的干部，很容易贴近，有着很多共同话题。同时，每到一地调研、开会，甚至是休体休息，他都要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陆学艺说：“菜市场里有学问。”菜价高低一方面显示农产品供应的市场情况，另一方面反映当地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了解菜农的收入状况；菜的品种，一方面体现市场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地的特产，特产就是一种当地的文化；卖菜的吆喝声、买菜的讨价还价声，可以看出当地百姓生活的文化日常、规则与习惯。他认为，菜市场看多了、走多了，对不同地域的菜市场微观调查就有了比较，再对照当地的地情、“人情”、地貌以及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就可以从这些微观的调查中大致判断当地中观或宏观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百姓的生活水平。

每当陆学艺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他都会要求他们回乡后做一些调查研究，回来向他汇报。这是想让学生也养成他早期利用寒暑假调研的习惯，多了解实地、多接触群众、多交朋友。正如陆学艺强调的，搞社会学既要看到物，更要看到人，真正的学问在下面。

